

乾隆帝的百寶箱

賴惠敏*

李漁《夏宜樓》小說描述一位書生瞿佶，在街肆上買西洋千里鏡。他登塔試眺，照見一位美女名叫嫋嫋，居處夏宜樓，容貌端莊過人，決計娶其為妻。千里鏡打破男女空間區隔的藩籬，結局為「吉人既佔花王，又收盡了群芳眾豔」。李漁是明末清初的文人，在那時代已經有西方傳教士引進洋貨到中國來，而他是第一位把望遠鏡寫入小說的文人。到十八世紀，《紅樓夢》小說中出現的西洋器物更多，書中描寫劉姥姥進大觀園，見到自鳴鐘「只聽得當的一聲，又若金鐘銅磬一般，不防倒唬的一展眼。」賈府的大時鐘、大鏡子，婦女穿著毛皮服飾或使用瑪瑙、鼻煙壺等物品皆是洋貨。然而，《紅樓夢》出現的洋貨和清宮的洋貨比起來，又顯得小巫大巫。清宮有粵海關大量採辦洋貨，乍浦港進口的日本洋銅和各種東洋器皿等，還有從恰克圖俄羅斯進的毛皮、紡織品等。這些進口的毛皮、毛織品、珊瑚、銅、錫、鉛、玻璃、紫檀木、洋氈數量眾多，令人嘆為觀止，由此可見清人對西方舶來品的興趣，值得深入探討。

經由貿易數量的變化來觀察洋貨影響人們生活的品味，是近年來中西學者關注的焦點。彭慕蘭教授（Pomeranz Kenneth）《大分流》討論歐洲和中國的奢侈消費，如糖、絲、棉產量影響城市居民的品味。此外，西洋的眼鏡、飾品、毛皮，與食品魚翅、燕窩等舶來品也在中國迅速成長。彭慕蘭認為中國人對西方進口的舶來品興趣不大，唯有燕窩例外。Harold Kahn（康無為）曾提到十八世紀的北京在生活方式或服飾上，並未模仿外人，也沒做過什麼調適，不像八世紀長安那樣，深受唐帝國外緣的突厥及波斯人的風格與貨物影響。然而，十八世紀盛清時期，皇帝宮廷生活無不奢靡鋪張，洋貨充斥宮廷。洋貨成為清朝帝國統治的利器，用於賞賜蒙古王公、西藏喇嘛等，締造太平盛世，不能忽視它的重要性。西洋物品在宮廷大量使用，北京內城是旗人居住的地方，城內的東西兩廟：東城的隆福寺和西城的護國寺，一日能消耗百萬錢，消費者極盡所能的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購買洋貨。《北京竹枝詞》提到乾嘉時期洋貨充斥北京，如大小絨、嗶嘰、羽紗、紫檀、火石，及所製時辰鐘錶等物，精巧絕倫。朝鮮王國每年派使臣到北京朝覲，許多使臣的日記都提到北京繁華且奢侈的景象。

近二、三十年來，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大量開放清宮檔案，其中《內務府廣儲司六庫月摺檔》記載乾嘉時期宮廷度藏的洋貨。洋貨影響宮廷的衣食住行外，同時流通於城市。研究物質文化的學者認為奢侈品本來是貴族用來顯示特權身分地位的象徵，消費社會形成後，任何人只要有錢就可以購買到奢侈品。貴族的消費模式被下層社會所仿效，隨著城市化更促進仿效的現象，且在城市內造就了這種消費的集中市場。潘榮陞撰《帝京歲時紀勝》記載乾隆年間帝京品物，「金銀寶飾，開敦華、元吉之樓；綵緞綾羅，置廣信、恆豐之號。貂裘狐腋，江米街頭；珊瑚珍珠，廊房巷口。靛青梭布，陳慶長細密寬機；羽緞氈氍，伍少西大洋青水。冬冠夏緯，北于橋李齊名。滿襪朝靴，三進天奇並盛。織染局前鞞帶，經從內府分來；隆福寺裡荷包，樣自大宮描出。」江米街（現在的東交民巷）專賣貂裘狐腋；廊房巷賣珊瑚珍珠。北京百貨齊聚，服玩之好，厭古而喜新；爭奇而誇美者，必曰宮樣。乾隆皇帝面臨全球化的貿易，有意推廣奢侈品的使用，在禮制上規定貴族、王公、官員的服飾，並領進西方、西藏等地工藝技術，影響了北京城市工商業。從乾隆皇帝的百寶箱中，可見 1760 年工業革命後，全球化貿易趨勢改變了清宮物品的喜好，乃至影響到禮儀制度的變化，而這些變化都與皇帝設計（？）、西洋、西藏技術支援，群臣傑出的執行力，以及手藝精湛的工匠有關。可以從四個面向來觀察：

一、清宮物資與全球化

過去學者注意到清代朝貢體系，主要透過禮儀制度建立起宗藩等級名分關係，並進行各地貢物物資的互換。在工業革命之後，全球貿易興盛，以朝貢名義來進行實質的貿易為必然趨勢，其中最顯著的是毛皮和紡織品的貿易。十八世紀清朝統治的帝國版圖擴張至喀爾喀蒙古，與俄羅斯接壤。俄國每年輸入中國的毛皮達數百萬張，至十九世紀恰克圖與萊比錫（Lipsia）為全球兩處毛皮貿易的重鎮。商民從俄羅斯進口的毛皮、西洋紡織品銷遍中國各城市。

中國歷史上任土作貢的傳統下，貢錫、鉛數量相當多。實際上，從日本進口洋銅，從英國東印度公司（The 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及荷蘭東印度公司（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進口錫、鉛。英國、荷蘭船隻運送的錫原來是

壓船艙用的，後來發現中國人祭祀焚燒錫箔冥紙用量多，荷蘭東印度公司輸出中國的錫大為增加，錫和鉛的合金稱為六錫，清廷大量用於宮殿建築防水、旅行輕便器皿、茶罐防潮等，用途相當多元。

二、洋貨與清宮禮儀制度

乾隆十三年（1748），皇帝命允祿編輯《皇朝禮器圖式》，這套圖譜包括祭器、儀器、冠服、樂器、鹵簿與武備六部。帝室、王公、百官等穿用按照冠服圖的規範，形成階層分明的社會。宮廷製作服飾取動物毛皮之精華，如海龍帽沿、黑狐端罩、金銀下頰長褂、海龍皮長褂等。衣、褲的製作過程是將小塊毛皮拼裝加工，只取毛皮最珍貴的部位——狐賺、下頰做成長褂。縫製手工細緻，有所謂「針腳細若蚊睫，工藝精妙絕倫」之說。毛皮加工必須注意柔軟、明亮，內務府使用「炸」、「染」、「燻」的方式功夫獨到。又規定：「本項匠役不敷應用，仍添外僱民匠」，這些外僱工匠成為北京毛皮業的重要成員。宮廷毛皮製作的材料和技術影響北京毛皮手工業，至民國年間北平仍為皮貨製作之重心。

清代皇室使用的金銀器皿，在《皇朝禮器圖式》有詳細的界定等級。皇太后、皇帝、皇后、妃嬪等的鹵簿、膳具有著不同成色的金銀銅錫器皿。乃至皇室成員去世後，其祭器亦以金屬來區分貴賤。

三、清宮的工藝技術

宋應星著《天工開物》描述冶鑄、錘鍛、焊接等技術相當經典，但在實際做法上僅有簡要的說明，並沒有詳細記載相關物品設計、具體尺寸和耗材用量等。清宮檔案在這方面的資料相當齊全。乾隆皇帝下旨諭令官員或匠役成做器物，首先得呈「樣」，再依照皇帝喜好進行樣的修改，樣包括紙樣、蠟樣、合牌樣等。另外，章嘉國師所繪製的佛像的樣，亦不容忽視。再者，莊親王允祿參與各種器皿的製作，他所帶領的工匠來自全國各省，為當時工藝技術的佼佼者。清宮在工藝上有圖、模型、文字說明，將工藝趨於標準化、定型化，可以大量複製各種佛像、法器、祭器等。

值得一提是清宮充分掌握各種金屬合金技術，製作傑出的藝術作品。例如皇室引進歐洲的畫琺瑯生產技術，以及來自尼泊爾、西藏的銅造像技術，吸收知識後再予以創新；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不僅投入資金，更參與產品設計。

康熙皇帝干預組織結構、管理生產和交流，而雍正和乾隆皇帝則投入到產品設計中，並在物品上打下烙印。「乾隆年間製」有如現在的商標，成為古物收藏家鑑定的印記。

過去，西洋傳教士的技藝影響宮廷已有許多學者討論，譬如繪畫、琺瑯、西洋鐘錶等，西藏工藝則較少受到關注。《章嘉國師若必多吉傳》載：「他只要用手觸摸一下，就能查知佛像等物品製作的好壞，區別出是用印度的還是用西藏的新舊銅料製作的，對唐喀的圖像的好壞也有很強的鑒別能力。」此外，清朝有許多轉世活佛稱為呼圖克圖駐錫北京，稱駐京喇嘛。乾隆皇帝常諭令他們辨別各種器物的年代、成分和製作程序，他們亦參與佛像和佛塔的製作。

四、宮廷與北京城市文化

近年來，關於明清時期百姓對士大夫消費習慣的仿效，有巫仁恕研究晚明士大夫的消費文化，特別重視鑑賞的品味，以「雅」、「俗」作為士人與庶民之間的區分，具有社會區分的作用。《北平市工商業概況》載：「清代養心殿設有造辦處，專為內庭供奉。其時各地製造首飾之名工，罔不招致其中。又前外打磨廠內戩子市，向為首飾樓聚集之所，承造滿籍貴族婦女之扁方墊子，鑲嵌金玉珠翠，備極精巧。業此者出入府邸，藉通聲氣，頗有勢力。此外各首飾樓製造滿漢首飾，為各士商眷屬所購用者，更為普遍。」說明造辦處網羅各地名匠，這些工匠又將宮廷的式樣帶出，成為商號仿做的對象。楊靜亭編《都門雜記》特別標明「內式暖帽」、「內式荷包」等，皆是宮廷樣式。

紫禁城並非獨立於高牆內，它與北京城市關係密切，乾隆皇帝的百寶箱包含了各種中西物資，再由皇帝訂立禮器規範，交由工匠成做器物，最後流傳至北京及全國各地。